

中國傳統文化畫庫

中國三大教及傳說

ZHONGGUO SANDAJIAO JI CHUANSHUO



山東美術出版社

ZHONGGUO CHUANTONG I

中國三大教及傳說

ZHONGGUO SANDAJIAO JI CHUANSHUO

- 陳詠明 金銘子 編文
- 蒲慧華 岳海波
- 李 勇 許錦集 繪畫
- 于文江 趙芳廷

山東美術出版社 ●

魯新登字 04 號

中國三大教及傳說

陳詠明 等編繪
岳海波

*

山東美術出版社出版發行
(濟南市經九路勝利大街 39 號)

山東新華印刷廠德州廠印刷

787×1092 毫米 20 開本 7.6 印張 4 插頁
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199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2,500

ISBN 7—5330—0897—9/J·896

定價: 45.00 元

序

余 敦 康

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輝煌的時代、輝煌的思想、輝煌的文化。儒、釋、道三大教正是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的體現，是我們祖先所建樹的煌煌偉業。

就外部功能而言，儒、釋、道三教有些根本性質上的差異，儒教是立足于政治倫理的哲學，佛教和道教是立足于信仰的神學。不過這也不是截然的分別，它們也有殊途同歸的地方。儒教與西周的天命神學的聯係相當緊密。周人的天命神學思想，一方面宣揚天命是不可抗拒的，天命決定人類的命運；另一方面却又重視人事上的主觀努力，認為搞好人事也就是順從天命。儒家對西周的天人之學的繼承與變革表現得至為明顯。孔子的思想可以說是一種從宗教到哲學的過渡體系，後世儒家雖然人文主義色彩很重，但是也沒有完全割斷與天的聯係。從西周的天命神學延續下來的天人關係問題始終是各種社會思潮關注的焦點，因此佛道二教盡管各有其獨特的成仙成佛的宗教修行的方法、步驟和途徑等問題，在哲理思辨上却受到天人合一思想的强有力的支配。天人之學凝聚着中國人所特有的思維模式，表現了中國傳統思想的基本精神。

漢晉之際佛教傳入中國後，立即開始比擬黃老，附會玄學，逐漸乖遠了產生在印度土壤上原始佛教的冥想和出世的特點，將溝通天與人，主與客，自然、社會與主體精神作為探討的重點問題之一。對後世影響最大，可稱為純粹的中國佛教的禪宗，提出顯示其理論特色的“平常心是道”、“吾心即佛”等說法，流露出天人之學思辨邏輯的明顯痕迹。所謂佛學的中國化，其實質性的含義就是中國傳統思想中天人之學對佛學的改造，同時也是佛學對這種天人之學的豐富和補充。

中國道教在神學理論上比較膚淺。它與儒學同屬中華文化，植根于中華大地，自然地形成一種互為影響互為補充的圓融關係，所以也探討許多有關人事、政治，特別是天人相互關聯、相互作用的問題。宋代以後蔚為大觀的道教內丹學，主張內煉精氣神，取法于身外天地，可說是傳統天人之學的一種宗教變形。

儒、釋、道三教都是對自然、社會、人生的總體性把握，都有囊括宇宙、統貫天人的完整的體系。它們體現了中國古代認識的不斷深化和發展，同時也凝結着不同時期的人們對合理的社會存在的理想和期望，對最高精神境界的追求，所有這些，錯綜交織為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既具有認識論的意義，也具有價值觀的意義。

在歷史上，儒、釋、道三教始終處于新舊交替、推陳出新的運動過程，形成生命洋溢、奔騰向前的洪流，并廣泛地向外滲透到文學藝術和其他的精神領域。這些曾經體現了中國古代各個時期之時代精神的學說或思想，作為民族文化傳統，一直延伸到我們的生命和血脈中。從各種現象和各種感覺中，都可體會到它們不僅是只屬於過去的文化遺蹟，而且也存在于我們的信念、理想、情操，甚至性格之中，拂之不去，揮之復來。這是超越了地域、語言、膚色等外表的標識，最深層次的民族特點，是我們將自己稱之為中華民族的最重要的內在根據。

《中國三大教及傳說》將鳥瞰式的文化概述與生動具體的傳說故事相結合，再以具有時代感的傳統工筆繪畫形式表現出來，既不乏理論內蘊，又富有民間氣息，是一種雅俗共賞的新嘗試。古代哲人所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古代畫家所說“離形得似”，都是要求人們不僅拘泥于形象，更應把握形象後面的真理和神韻。我希望讀者在閱讀時，也不僅僅停留在引起美的遐想的故事和畫面上，同時從中領悟到一些更加深邃的東西，一些能夠聯係傳統與現實、繼承與創新的東西。

1992年7月6日

目 錄

綜述部分

中國儒教.....	1
中國道教.....	7
中國佛教	14

傳説部分

孔子的傳説	21
福神的傳説	48
老子與尹喜的傳説	61
玉皇大帝的傳説	84
千手千眼觀音的傳説.....	101
善友太子入海取寶珠.....	116

中國儒教

在中國歷史上，儒、釋、道三教并稱。但是，其中儒教與釋、道二教不同，它雖然帶一點宗教色彩，但并不是宗教。

“儒教”這個詞語，由來已久。如《晉書·宣帝紀》說：“魏晉浮蕩，儒教渝歇。”《全梁文》卷二載梁武帝《置五經博士詔》說：“魏晉浮蕩，儒教衰歇。”直到近代，戊戌變法的領袖康有為著《孔子改制考》，還說“儒教為孔子所創”，“孔子為萬世教主”。這裡所謂儒教，都是對儒家教化或教義的稱謂。

從兩晉南北朝開始，很多文人盛言三教合一，如孫綽《喻道論》說“周孔即佛，佛即周孔”，謝靈運《辨宗論》說儒與佛“理歸一極”，梁武帝《會三教詩》說“窮源無二聖，善測非三英。”在後世的思想領域，三教確實出現合流的趨勢。古代文人把儒、釋、道三教并列，大都是從理論的層次，并非是從信仰的層次而言的。

在歷史上，像西漢時期的董仲舒以及宋代理學家，竭力神化儒學和孔子，使儒教產生許多可以與宗教相比擬的地方。譬如孔子有時被抬高到神聖的地位；《四書》、《五經》等經典經過渲染和神秘化，類同宗教經典那樣神秘和崇高；祭孔、祭天、祭祖等活動近乎宗教儀式；儒生定期聚會朝拜的孔廟也可比作進行宗教活動的廟或觀；經師彷彿是固定的神職人員，等等。盡管儒教顯示出某些宗教的特性和功能，但它畢竟與宗教有本質差別。孔子說：“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儒教不是把人們引向彼岸世界和來世幸福，而是引向以“三綱”、“五常”為核心的人與人的社會關係中，用道德教育代替鬼神崇拜。所以儒教不是宗教，它可以與釋、道等列的原因，在文化、思想和哲學等方面。我們在這裡談論儒教，也是取其教化或教義的涵義。

一、孔子和儒家

儒家的創始人為孔子。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前 551—前 479 年），春秋後期魯國人，年輕時很窮，曾在魯國做過官吏。後自辦學校，以教書為業。他曾費時 13 年周游衛、宋、陳、蔡、楚等國，宣傳他的政治主張，但均不為統治者所用，最後返回魯國，窮困潦倒而死。

孔子是一位偉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在政治上尊崇堯、舜、文、武、周公，贊揚西周的制度，認為那時才是人類最完善的社會形態。他對西周社會形態的認識，其實增加了許多主觀的理想成分。孔子認為大至國家，小至家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都要以一定的倫理道德來維係，要求建立明確而嚴格的秩序和規定，以分清上下等級、長幼尊卑。他主張實行仁政和禮治。“仁”是講做人的道理，是孔子思想體系的中心；為實現“仁”而制定的具體制度和行為準則稱之為“禮”。孔子關於仁和禮的學說奠定了我國古代有關政治和社會倫理的思想基礎。

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還有孟子和荀子。孟子（前 390—前 305 年）名軻字子輿，鄒（今山東鄒縣）人。他繼承并發展孔子的仁政學說，主張“保民”。所著《孟子》一書，以“義”為理論核心，對諸侯混戰和當時各國的政治多有所抨擊。孟子在儒家中的地位僅次于孔子，稱為亞聖。

荀子（前 313—前 238 年）名況，趙國人，為著名的學者和政論家，時人尊稱他為荀卿。荀子繼承了孔子關於禮的思想，發展了禮治學說，主張禮、法結合，建立天下為一的中央集權國家。

自從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儒家雖然經歷了許多重要的發展階段，甚至多次改變形態，但在整個封建社會歷史時期延續不絕，成為各個朝代奉作統治思想的正宗學派。漢、唐的經學家，宋、明的理學家，清代的新經學家，和鴉片戰爭前夜以龔自珍、魏源為代表的今文經學家等，都屬於儒家範疇。歷代儒家的理論和實踐，構成中國文化中的儒教系統。

二、經學及其發展演化

戰國時期，孟子倡導仁政，荀子主張禮治，從不同角度發展了儒學。從漢到唐，儒學以經學的形態出現。

“經”指儒家的經典。《莊子·天運》說：“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此後，“經學”遂專指訓釋、解說儒家經典的學說。唐代，國家通過官辦學校的學習科目及科舉考試的項目的規定，要求讀書人研讀九經，即《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氏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易經》、《尚書》、《詩經》。後又加《論語》、《孝經》、《爾雅》三經，見于唐文宗開成二年（837 年）所刻的石經，合稱十二經。到了宋朝，理學家們又把《孟子》提高到經書的地位，從此儒家經典便成了十三經，直到封建社會終結，再也沒有變化。

我國古代浩如烟海的典籍，大體按經、史、子、集四部分類，經部為首，而

十三經又在經部中居首位。儒家經典在古代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見一斑。

在戰國和西漢時期已經有專門著作對儒家經典加以解釋，闡明其經義。當時習慣上稱這樣的著作爲“傳”或“記”。後世解釋傳、記，并兼通經義的著作稱作“箋”“疏”或“正義”等。傳、記的出現，開創了訓解、闡述儒家經典的所謂經學。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產生了許多經學流派。它們的盛衰、分合、爭辯直接關係着社會政治和社會現實。漢代經學主要分爲今文經學派和古文經學派，長期爭論不休。今文經學重微言大義，古文經學重名物訓詁。宋代經學變爲理學，重義理。清代經學恢復了漢學學風，重在考據訓詁。經學不但含有儒教的思想依據和理論內容，而且包含着豐富的史學、哲學、倫理學、文學藝術等方面的資料，形成一個儒教文化體系。

三、禮制和宗法

儒教最重要的教化內容是禮制和宗法制。

儒家所尊奉的系統的禮制，可以上溯到周代。傳統的說法，把禮劃分爲吉禮、凶禮、軍禮、賓禮、嘉禮五類，稱爲五禮。關於五禮的說法起源于現存的《周禮》一書，後來爲歷代禮學家所沿用。吉禮，就是祭祀的典禮。古代認爲祭祀是“國之大事”，所以把吉禮列爲五禮之首。凶禮，一般理解是指喪葬，不過據《周禮》所載，除喪事以外，凶禮還包括對天災人禍的哀吊。軍禮，主要指軍事活動的典禮，還包括田獵、建造城邑等大規模動員人力的活動。賓禮，主要指諸侯對王朝的朝見、各諸侯之間的聘問和會盟等等。嘉禮，其內容比較復雜，主要有婚禮、冠禮、饗燕、立儲等類。其中的冠禮，是古代男子到20歲時一定要舉行的一種成年禮。

古代所謂禮，不僅是社會生活中的規定和儀式，還包括國家政治制度在內。從種種史實考察，在當時的禮和法律、官制之間並沒有明確的界限，許多政治、法律方面的規定都見于禮的內容。所以各朝都設有專門管理禮制的官職。在西周，禮制管理的最高官員是大宗伯。到了東周，隨着社會變革，禮制逐漸崩壞。這時，有關禮的知識成爲某些知識分子專門傳授、掌握的學問，與禮官逐漸分離，出現了禮學。禮學的主要倡導者，是孔子所創立的儒家。

現存儒家經典十三經中，《周禮》、《儀禮》、《禮記》三部書是屬於禮制的，稱爲三禮。儒家崇尚繁文縟禮，在先秦就受到墨子等學者的詰難。此後，禮制在歷代儒生手中踵事增華，變本加厲，成爲約束人的個性、意志、情欲和思想的教化體系。特別是宋明理學家所倡行的禮教，苛刻繁難，可說是一種精神桎梏。朱熹所

編《家禮》一書，是其代表作。

與禮制密切相關的，是古代宗法制度。

宗法是中國古代社會血緣關係的一種原則，其主要內容是貴族家族的嫡長繼承制。嫡，指貴族衆妻妾中之正妻；長，指正妻之長子。爲嫡長繼承制所決定，一個大的貴族家族中又衍生出稱作“大宗”和“小宗”的家族，從而建立起血緣關係上的等級制度。

大宗和小宗的區分，必須從一個家族的始祖講起。周代大夫、士階層家族的始祖，一般是國君的別子。例如魯國是周朝分封的諸侯國，其國君是按嫡長繼承的傳統世襲的，常理以嫡長子繼承爲君，國君的次子及以下各子，即嫡長子的弟弟，就是別子。別子不能與繼位的長子同祖，必須分出去自立一家，成爲大宗的始祖。所以《禮記·大傳》說：“別子爲祖，繼別爲宗。”意謂由別子的長子長孫延續這個貴族家族中的大宗。別子的長子是大宗的繼承人，但他還會有次子或更小的兒子，即所謂庶子。庶子延續的家族屬於小宗。

由大、小宗構成的整個家族中，繼別的大宗居族長的地位，享有一定的特權，稱爲宗子。貴族的身份即由宗子承襲。

宗法雖然是看不見的血緣關係，但常常通過具體的禮制表現出來。例如當某人死去，親屬穿戴的喪服有嚴格規定，隨血緣關係遠近而明顯不同，守喪及哀悼的禮節也有細致的區別。宗法制是儒家道德倫理的基點。所以新文化運動著名的啓蒙學者吳虞說：“以君父并尊，爲儒教立教之大本。”

四、太學與書院

儒家認爲必須用政教風化和通過學習來改造社會、改變人心、防止邪惡，所以特別重視教育。

古代進行教育的主要機構是太學和書院。

西周即有太學，對貴族子弟進行禮、樂、射、御、書、數等六藝教育，具有官辦性質和文武兼備的教學特點。太學在東周漸漸衰落，於是民間開始出現私人講學的新風尚。先秦的諸子百家，大都聚徒講學，其中儒家更爲重視講學。孔子首創私學，按照“有教無類”的原則廣招門徒，有弟子 3000 人，高才生 72 人，并漸漸形成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其弟子各有擅長。

漢武帝接受董仲舒、公孫弘等人的建議，設五經博士，并爲博士置弟子 50 人，開漢代太學之先河。董仲舒說：“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可知從漢代開始，太學就成爲培養儒家人材和宣傳儒家教化的基地。東漢質帝時太學

生發展至3萬餘人。漢代太學以儒家的六經為惟一的學習科目。魏晉南北朝至隋，玄學、文學、史學都有很大發展，儒家經典在太學失去獨尊地位。西晉時，出現了與太學性質相同，但是專門教授貴族子弟的國子學。儒學地位在唐代又呈回升趨勢，國子學、太學和四門學（于京師四門設置學校，故稱）都只學習儒家的“正經”和“旁經”。宋、元以後，隨着封建思想禁錮的加強，儒經一直是太學和國子學的主要課程。

書院與官辦性質的太學不同，它基本屬於民間性質。書院起源于唐末五代干戈紛擾之際。有些儒者受佛、道的影響，往往選擇名勝之地修建精舍，以為群居講學的地方。書院經濟獨立，有學田作為經費來源，供給學生膳食。它的主持人稱作山長、山主、洞主、洞正或堂正等，教員稱作副山長、助教、書講等。書院都掌據一批由私人捐贈或國家頒發的圖書，供教學之用。

書院到宋代開始興盛起來。當時，因太學與仕途密切相關，故極易受官場惡濁風氣的影響。如葉適《論學校》就指責秦檜等亂臣賊子，以利祿引誘諸生，致使道德淪喪，學風敗壞。針對太學的種種腐敗和流弊，民間書院應時而起，以專心研討學問、講道明理相號召。宋元以來，歷代朝廷都竭力插手和試圖控制書院，但書院作為獨立于官學系統之外的特有的教育組織，一直保持着民間性質。

宋以後，理學家及宿學老儒多在書院講學。《四書》、《五經》是歷代書院的通用教材。書院的儒學風氣更盛于官學。明代萬歷年間，顧憲成、顧允成兄弟與高攀龍、孫慎行等在無錫建立東林書院，興一代新學風。東林諸子重氣節，有正義感，積極參加政治活動，使書院成為反對閹黨和朝廷鷹犬的思想基地。東林書院充分發揮了儒教中積極的方面，名留青史。

“學而優則仕”，是中國古代文化傳統的重要表現之一。漢代舉薦人材，設秀才、賢良方正、賢良文學、孝廉諸科目，儒家思想和儒家道德倫理觀念是考核人物的主要依據。唐代取士之科雖繁，但儒經是基本內容。宋代科舉沿用唐制，取士考試儒家經義。明代只設進士科，經義限于《四書》、《五經》，試文要求采用八股形式，代聖人立言，模擬儒聖語意。清代科舉沿用明代舊制。由此可知，儒教既是古代教育的重要內容，又密切關係着讀書人的仕進之路和政治前途，因此，它在古代社會生活中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

五、儒教文化的特點

由于儒教一直在中國文化史上佔居主導地位，所以儒教文化實乃中國文化的核心。在某種意義上講，它的長處和短處也充分表現于民族文化傳統中。

儒教文化的長處，大概有三。第一，孔子提出的仁學確立了中國文化重視道德倫理和精神生活的價值觀。孔子所謂“仁”，既是“泛愛衆”的人類之愛，又是由近及遠的差等之愛。儒家要求將這種外在的、社會規範性的仁愛轉化為個體內在的自覺，即自覺的仁者之心、仁愛之心。仁雖然是封建等級制度之下的道德原則，但它的長期熏陶和潛移默化，却客觀上促成了一個以道德教育代替宗教的傳統，以及在士大夫和勞動人民中存在一個重視氣節和操守的傳統。第二，儒家所持的積極樂觀的有為精神，對於中華民族的發展，起到良好作用。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明確反對出世思想，總是力圖建立起一種理想的社會新秩序。他自稱“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當時的隱士譏諷他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儒家堅持積極有為的精神，形成了一個奮發向上，自強不息的傳統。第三，儒家發揚了重視歷史經驗的優良傳統。章太炎曾指出孔子開創了重視歷史的傳統，是很有道理的。從孔子開始，歷代儒家注重搜求、整理歷史資料和文化素材，使中國的文化遺產和歷史典籍在世界文明古國中最為豐富，這個功績不可抹煞。

儒教文化也有其弱點，大概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孔子主張述而不作，並不十分鼓勵創新。漢代經學、宋明理學以及清儒的考據之學，都比較缺乏創新精神。在封建社會，雖然也有不少知識分子努力探索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奧秘，但沒有形成一個普遍的社會風尚。第二，孔子強調德治，對於軍事重視不夠。孔子曾說：“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歷代儒生大都主張以禮樂制度進行統治，反對征伐，促成重文輕武的傳統精神。第三，孔子推崇禮樂，對於農、工、商、賈和生產勞動重視不夠。孔子曾有過輕視農稼的議論，又主張重義輕利，這形成後代儒生“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意識。在以自然經濟為基礎的社會中，儒生不得不關心農稼，但對生產勞動和商業活動却存在根深蒂固的偏見。

儒學誕生在周朝氏族貴族統治體系開始崩潰的時期，它把氏族社會晚期的巫術禮儀和統治體系規範化、系統化，並加以改造，形成自己的思想和教化體系。儒家所提出的具體政治經濟主張含有保守性，但它的思想和教化中也包含着氏族民主遺風、原始人道主義和對於理想人格的追求，則含有一定的合理因素，有待於深入開掘。後世人們，從其現實利益出發，各取所需，強調其中的某些方面，以服務於當時社會的需要，由此造成原始儒學和後世儒學，以及各個不同歷史時代的儒學的區分。但是，這其中畢竟存在着某些一以貫之的東西，通過歷史的血脈流傳不絕。這就是作為中國古代文明精神支柱的儒教文化。

中國道教

道教與基督教的新舊兩教、摩尼教、伊斯蘭教、佛教等宗教不同，它既不是世界性的宗教，也不是外來宗教，而是真正在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道教與封建時代人們的精神生活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充分反映了中國人的宗教意識。因此，了解一些有關道教的知識，可以從一個側面了解中國的文化傳統和古今中國社會。

一、道教的核心與道教的起源

道教的核心內容是神仙思想和《老子》學說。

神仙傳說可追溯到戰國時期，一出自荊楚文化，一出自燕齊文化。《莊子》、《楚辭》等書中都有關於神仙形象的生動描述。當時燕、齊等地神仙傳說流行較廣，出現了不少以求仙和煉丹爲生，自稱能夠長生不死的方術之士。《史記·封禪書》載，傳說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在渤海中，能見而難至，有至者謂其上有仙人和不死之藥。齊威王、齊宣王、燕昭王都曾派人入海探求三神山。秦始皇統一天下後，派遣徐福領童男童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仙藥，又使方士韓終、侯公、石生等求之，結果費用甚巨而一無所得。到了漢代，漢武帝更醉心于神仙方術，亟欲成仙登天，多次受術士的欺騙，仍然痴心不改。東漢大哲學家王充所著《論衡》有《道虛》一篇，專門駁斥仙道傳說，其中例舉了廣泛流布的傳說有黃帝鑄鼎飛升、淮南王得道升天、盧敖學道成仙、東方朔度世不死、老子修道成真人以及王子喬辟谷不食等等。由此可知，神仙思想從戰國至東漢，已形成一股社會思潮，以方士爲傳播載體，發揮着越來越廣泛的社會影響。

除了神仙思想之外，道教還與先秦道家思想關係密切。只有在它依附了道家的理論之後，才形成一套獨特的道教神學體系。

道家屬於先秦諸子學派之一，是一種哲學的派別，不是宗教。道家的《老子》和《莊子》均不宣揚存在某個至上的神，而是大力描述一種超乎形象的宇宙絕對精神（道），作爲至高無上的支配力量。由于道家思想充滿神秘色彩，很容易加以附會，道家又崇尚虛無恬靜，頗類似神仙的境界，再加上《老子》的五千言，

辭義抽象，便于傳教者作出神秘的解釋，文字押韻，宜于信徒朗誦和記憶。因此，後世道教徒便將道家創始人老子抬出，作為本教的教主和尊神，又將《道德經》（即《老子》）加以神化，奉為道教經典之首。

神仙思想和道家理論是道教的主要依據。此外，古代宗教和民間巫術、儒家某些理論和陰陽五行思想、古代醫學與體育衛生知識等，也為道教所吸收。

原始道教組織始建于東漢末年。東漢時期，神仙方術逐漸形成兩個派別。一派以宣揚長生成仙和修煉內外丹的理論為主，相傳東漢桓帝時，魏伯陽所著的《周易參同契》，就是這一派的代表作，這一派以後發展為道教中的“丹鼎派”。另一派以宣揚鬼神崇拜，畫符念咒，祈福禳災為主，相傳東漢末出現的《太平經》又稱《太平清領書》就是這一派的代表作，這一派以後發展為道教中的“符籙派”。

由于丹鼎派煉製外丹，需要耗費相當的財力物力，所以只能在上層社會中流行。而符籙派的符籙咒水，既省錢省力，又能“治病”或“驅鬼”，特別是能給處于災難深重境遇中的人們帶來廉價的精神安慰，因此在下層勞動人民中有較大的影響和吸引力。漢代末年，社會黑暗，政治動蕩，民不聊生，這時張陵創立了“五斗米道”，張角創立“太平道”，這是最早出現的兩個原始道教組織，而且都屬於符籙派。

張角是鉅鹿人，他以《太平清領書》為思想基礎，在漢靈帝光和年間創立了“太平道”。他和弟子們一方面宣傳拯亂世、致太平的思想；一方面開展驅鬼降妖、治病救人、祈福禳災的宗教活動。十余年間就發展信徒數十萬人，分布于全國各州。他們聲稱“蒼天已死，黃天當立”，發動了規模浩大的農民起義。因為他們起義時都戴黃巾為標幟，所以人稱黃巾軍。黃巾軍起義失敗了，“太平道”也隨之息滅了，但是它最終導致了漢王朝的滅亡。

“五斗米道”的創始人張陵是東漢順帝時人，學道于四川鶴鳴山，自稱“天師”，假托太上老君口授，造作道書，傳授道徒。據說受道者都要交納五斗米，所以人們稱其為“五斗米道”。張陵死後，其子張衡繼續行道。張衡死後又由其子張魯繼之。張魯在漢末軍閥混戰時割據四川、漢中一帶，掌握政權近30年。他實行政教合一，按宗教組織系統治理民政。後來張魯投降了曹操，這種政體才改變。

五斗米道的情况與太平道不同，它非但没有覆滅，而且在後世演變為天師道和正一道，蔚成道教正宗。一代代的“張天師”教主，歷世不絕，聲望很高。

二、道教的沿革

兩晉南北朝時期，道教經歷改革，走向成熟。兩晉之際的著名道士葛洪，撰

《抱樸子·內篇》，對以往的神仙信仰和各種方術都作了系統整理和理論闡述，並猛烈抨擊民間道教和某些“流俗道士”的活動，這對道教從原始民間宗教向官方宗教的演變，在理論和實踐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葛洪去世後，從晉哀帝興寧二年（公元 364 年）丹陽士族楊羲、許謐等人製作《上清經》開始，中國南北方都進行了道教改革活動。當時，佛教已傳入中國並扎下根來，咒術色彩很濃的原始道教便相形見绌了，於是道士們和信徒們，都迫切需要創立一個不亞於佛教的道教。以北魏的寇謙之，南朝的陸修靜、陶弘景為首，道士們借鑒佛教的理論和宗教組織結構等，大量製作道書，製定戒律，使道教的教理、教規、教儀逐漸系統化和完整化。同時他們還注意吸收儒家的思想和價值觀念。如寇謙之就假托得到太上老君的旨意，要他宣布新的經誡，清理整頓道教，“除去三張（張陵、張衡、張魯）偽法”，“專以禮度為首”。經過他們的改造，出現了重視經典科教和神仙養生之術的道教新派別。其中有，北魏寇謙之的新天師道，以江西句容縣附近的茅山為活動中心的上清派等。另外，五斗米道也發生變化。其第四代教主張魯之子張盛帶着父祖的劍、印、經籙去了位於江西貴溪縣的龍虎山。傳說他在龍虎山發現了張陵準備煉金丹的爐竈遺址，便以龍虎山為大本營再興其道。這一道教，最重要的派系演變為天師道，後世又改稱正一道，在龍虎山上經營了一千六七百年，直到 19 世紀。

隋唐時期，是我國道教全面發展的鼎盛時期。

隋文帝熱心扶植和尊奉道教，使它得以較快地發展。到了唐代，道教得到前所未有的殊榮。李唐王朝以老子姓李，攀附為同宗，尊老子為唐宗室的“聖祖”，又先後冊封“玄元皇帝”、“玄元天皇大帝”等名號。他們神化老子，常以老子名義散布宗教讖言，意在達到維護統治等政治目的。唐玄宗利用老子的清靜無為思想作為治國理論的依據之一，執行簡政輕刑，與民休息的政策，對唐的繁榮和歷史上著名的“開元之治”曾起到過一定的積極作用。

唐代很有幾位皇帝尊崇道教，尤其是武宗，為了崇道而下令毀佛，拆毀寺廟佛像，強迫僧尼還俗，使唐代崇道活動達到頂峰。

隋唐很重視對道籍的整理和研究。隋王朝設立玄都觀，專門整理道教教義，編成《玄門大義》。唐玄宗于開元年間收集道書，編纂成藏，名《一切道經》。道籍成“藏”實始於唐。唐代道士張萬福、張承先和唐末五代的杜光庭等，對南朝時初具規模的道教儀法進一步加工整理，使之更趨複雜和完備。後世道教基本上以唐代儀法為準則。

唐代的文學、音樂、舞蹈、繪畫、雕塑、建築等方面都具有道教的内容。如

唐代大詩人李白的一些詩篇就明顯具有道教的情調。唐玄宗時的《霓裳羽衣曲》、《降真名仙之曲》、《紫微送仙之曲》以及《紫微八卦舞》等，就是爲在太清宮祭獻老子時所演奏的歌舞，這些歌舞都是由唐玄宗授意創作的，它們在古代音樂、舞蹈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唐代有不少道教神像的繪畫，如吳道子所畫老子像的刻石，流傳至今。在唐代，道教宮觀幾乎遍及全國，有些宮觀如太清宮、太微宮、紫微宮等，規模宏大，富麗堂皇，足可與皇宮中的殿堂比美。

唐代道教的正宗是南北朝以來形成的上清派和樓觀道等。宋金元時期，又出現太一教、真大道、全真教、金丹派南宗、淨明道、武當派等新教派。元以後，以正一教和全真教爲雙峰并峙的最大道教教派。

三、外丹術與內丹術

道教的目的是成仙，所以很講究修煉濟度的方法。其方法有服食、煉養、術法、科教、房中術等很多種類。服食是靠吃丹藥來變化氣質，去蕪存菁；煉養主要指通過身心的修煉，脫胎換骨，返本歸真；術法是研究星相、堪輿、占驗等術以求先知先覺；科教是諷誦經文，借修善積德以上格天心；房中術是指房中節欲、養生保氣之道。其他的方法或道術還很多，如隱形幻化、呼風喚雨、水行土遁、點石成金等等，多彩多姿，不一而足。

在道教的衆多煉養道術中，最引人矚目，最有特色的可說是外丹術與內丹術。所謂“外丹”，是指道士用某些藥物放在爐鼎中燒煉而成的丹藥。所用藥物，雖然在唐宋及其後有參用草木藥者，但是在唐宋以前，基本上全用金石藥，有鉛、汞、丹砂、雄黃、雌黃、石英、雲母等等。煉成的丹藥常呈黃金色，所以又稱金丹。道士們認爲服食金丹以後可以成仙。由于這些丹藥中含有劑量不等的毒素，求長生的人服食後往往因此喪生。有些種類的金丹在外表上與黃金相似，其實只是一種藥金，物理性質、化學性質并不相同。有些道士詭稱可以煉成真金，騙人財物。這類事情在歷史記載中有所反映，歷代小說家也常常以此爲小說題材。

所謂“內丹”，就是把人體比擬作“爐鼎”，燒煉體內的“精”、“氣”、“神”，據說這樣可使精氣神凝聚結成“聖胎”，即“內丹”。“外丹”與“內丹”統稱“煉丹”或“金丹”。

唐代是外丹術的黃金時期。隋代道士青霞子蘇元朗的《寶藏論》在當時很有影響。作爲唐代煉製外丹的基本理論是《周易參同契》。唐代諸帝大都相信服用金丹可以長生延年，不惜投入大量財力物力命道士煉丹，使煉丹風靡于世。很多著名的文士、詩人也對此有着濃厚的興趣，如李白、白居易等人即曾親自從事過飛

丹合藥。唐代很多帝王和朝臣權貴熱衷于服餌養生，常常因此殞命。歷代帝王中，以唐代服丹中毒而死者為最多。許多道士也因此被殺。嚴酷的事實促使了道教外丹術的衰落，從而向內丹術轉變。

宋元時代的道教，以內丹術的盛行和內丹學的成熟為一大特點。《悟真篇》、《翠虛篇》、《金丹大要》、《中和集》等許多內丹學專著相繼問世。內丹學主張以人身的精氣神為藥物，取法于身外天地，通過“逆行”秘法而返本歸源，與道合一。這樣煉就內丹，可以超出生死，成為真仙。內丹理論在傳統道教內丹術、煉養術和宇宙論的基礎上，融攝佛學、儒學和中醫學、天文學等知識，在此時臻于成熟化。它反過來又對儒學和道教中各符籙派產生影響。

四、道觀和道教的神仙世界

道士所居之處稱作“觀”(guān)。後世許多道觀建築宏偉，富麗堂皇。但在前代并不是這樣，名稱也不相同。據有關資料，漢代張陵所置道士館舍，是在土壇上建築草屋，稱作“治”。晉代的道室或稱“廬”，或稱“治”，或稱“靖”，都比較簡陋。大約在東晉末，有的修道者居住山洞，在旁邊蓋起館舍，稱作“館”。以後，有些道館遷入都邑。道觀之稱，初見于北朝，至唐代，才不用館字，都改稱道觀。唐宋以來，許多大道觀又稱作宮，規模宏大，確實可比肩宮室了。

道堂建立之初，裡面沒有神像。直到南朝宋，道教為了爭取信徒，才學習佛教的方法，在道堂內修塑神像，不過這時塑像還不很普遍。唐太宗時修建的太平觀、華陽觀等，已具備道觀的基本形式和結構。據說華陽觀內有正殿三間、兩廡、講堂、壇靖等，還有其它房宇門廊。并在內殿奉造“元始天尊像一軀，光趺八尺，左右真人夾侍”。現在保存的較著名的道教宮觀有北京的白雲觀、山西芮城縣的永樂宮、江西少華山的三清宮、河南開封的延慶觀、山東嶗山太清宮、廣東羅浮山沖虛古觀、四川成都青羊觀，等等。其主殿多為三清殿或三清閣，內中供奉三清神像，中央是元始天尊，左側為靈寶天尊，右側為道德天尊。三清神像的姿態及他們所持的圓珠、陰陽鏡、太極圖、扇子等物事皆有寓意，象征着道教的宇宙生成論。除三清殿外，有的道觀設有玉皇閣、八仙殿、後土殿等。還有些道觀不設三清殿，而專門供奉九天玄女、八仙、葛仙翁、雷公等神靈。道教的宮觀建築和其中的塑像、壁畫豐富多彩，難以盡述。它們既表現出具有驚人想像力的道教神仙思想，也是一筆極為珍貴的古代文化遺產。

道教像其它宗教一樣，也有一個屬於它自己的神仙譜系和神仙世界。歷代道士不斷完善着道教的神仙傳說，如晉葛洪的《神仙傳》、北宋張君房編成《雲笈七